

抗戰期間中泰軍事上的衝突與秘密往來

王文隆

摘要

抗戰期間，中國在國境南緣的作戰，較常被關注的是在印度、緬甸的遠征軍，也因為這是與英美關聯較大的戰場，較受到國際學界的關注與重視。然而，中國在國境南緣除了直接與日軍交火之外，亦因泰國投入日本所主張的大東亞共榮圈之下，使得中泰兩國雖從未宣戰，但實際上卻曾於國境線上交鋒。本文將以此為例子，討論中泰兩國在抗戰期間的武裝衝突，以及泰國於戰爭末期，透過駁火的國軍，試圖與重慶當局聯繫，嘗試於戰後獲得較佳待遇。

關鍵詞：西雙版納、九十三師、呂國銓、中泰關係

The Conflicts and Secret Contact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During World War II

Wen-lung Wang^{*}

Abstract

During World War Two the National Army of Republic of China fought not only in the mainland with the Japanese Army, but also along China's southern border with British Burma, Thailand and French Indochina. Most researchers focus on the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where the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ere involved, and neglect other fields such as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National Army of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National Army of Thailand.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Chinese-Thai clashes. Thailand, as a member of the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allied with the Japanese Army in fighting against the Chinese Army. At the same time, she tried to make contacts with the Allied Powers through the Chinese Army in hopes of better treatments from the Allie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Japanese Empire.

Keywords: Xishuangbanna, 93 Division, Lu Guozhen, Sino-Thailand Relation

^{*} Associate Professor,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抗戰期間中泰軍事上的衝突與秘密往來*

王文隆**

壹、前言

抗戰期間，重慶國民政府在國境南緣所耗費的心神，可能不亞於中國本土戰場，這是緣於中國南緣國境之外的香港、廣州灣、法屬印度支那、英屬馬來亞、海峽殖民地、緬甸、印度等地，在抗戰初期都曾經是重慶國民政府獲取軍事物資的重要轉運站，因而日本在1941年發起珍珠港事變後，這幾個支援中國對日戰爭的後勤補給站，都受到相當嚴重的摧折，並迅速落入日軍的控制。¹ 其中，除了印度之外，在東亞的英屬地紛紛淪陷，日本圖以封鎖重慶國民政府後勤補給的方式，窒息國軍的物資供應，壓制重慶國民政府。重慶國民政府為了維持補給生命線的暢通，以及配合盟軍作戰的需要，兩度派遣遠征軍進赴緬甸跨境作戰，另也為了協助英軍在東南亞刺探軍情，在英屬馬來亞與緬甸同英國情報單位進行過

* 本文曾於2017年9月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邁向和解之路：中日戰爭的再檢討」國際研討會中宣讀。感謝匿名審查人惠賜意見，俾使文稿更臻完美，在此表達謝意。
收稿日期：2018年5月31日；通過刊登日期：2018年8月27日。

**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¹ 法屬印度支那在法國本土淪失之後，其總督投向維琪陣營，自1940年起便開始與軸心國合作。關於抗戰期間中華民國與法國的關係，可參考王文隆，〈重慶國民政府與戴高樂政權間的雙邊關係（1941-1943）〉，收入唐啟華、張啟雄、川島真、李朝津、許育銘編，《多元視野下的中華民國外交》（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2年），頁65-100。

兩次情報合作。² 此外，重慶國民政府為了騷擾法屬印度支那的敵方勢力，也透過管道秘密支援越南獨立運動，給予越南國民黨等組織實質援助，幫助越南人民發動游擊。³ 抗戰時期在中國國境南緣周邊各國與重慶國民政府的互動，面貌多元，在各地的策略稍有差異，當前學界的研究成果也多聚焦在上述各項，或是以較大的視野，將重慶國民政府與盟軍（尤其是美國）的互動加以討論，如齊錫生的《劍拔弩張的盟友》，以及米德（Rana Mitter）所著《被遺忘的盟友》等著名作品。⁴

然而，或許限於資料的分布，也或許基於重慶國民政府對中國南緣各地關注焦點的不同所致，研究者在印緬偏重中國遠征軍的研究，對於印緬的獨立運動與重慶國民政府間的關聯幾乎沒有研究成果；在法屬印度支那偏重越南獨立運動的開展，在此的武裝衝突或是情報活動也沒有相當的研究成績。比較特殊的是泰國，這一個東南亞唯一的獨立國家，於1941年之前趁勢擴張，先是在1940年藉著法國本土陷落的機會，出兵法屬印度支那，奪占湄公河以西地區，並在日本的居間調解下占有該地。在1941年珍珠港事變爆發後，泰國復成為日本在東南亞的

² 關於中英兩國在英屬馬來亞與緬甸的情報合作，可參考王文隆，〈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對緬甸的接觸與政策〉，「紀念全民抗日戰爭爆發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中國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中正文教基金會，2017年7月7-8日；張奕善，〈二次大戰期間中國特遣隊在馬來亞的敵後活動（1942-45）〉，《國立編譯館館刊》，第2卷第2期（1973年9月），頁192-236。而中國遠征軍的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朱浚源長年關注，兼及孫立人將軍的相關研究，成績斐然，重要的有：朱浚源、潘昭榮，〈國軍反攻緬北戰鬥特色研析〉，《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8期（2003年4月），頁371-424；朱浚源，《孫立人言論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朱浚源，《孫立人上將專案追蹤訪談錄》（臺北：學生書局，2013年）。國史館亦於2015年抗戰勝利七十週年時，出版史料集，可參考周琇環、吳淑鳳、蕭李居編，《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料彙編：中國遠征軍》（臺北：國史館，2015年）。

³ 關於越南獨立運動與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的關聯，可參考蔣永敬，《胡志明在中國》（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年）；蔣永敬，《孫中山與胡志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1年）；羅敏，《中國國民黨與越南獨立運動》（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⁴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Lond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Frank McLynn, *The Burma Campaign: Disaster into Triumph, 1942-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合作夥伴，在日本的支持下，日泰聯軍合作，往南控制了英屬馬來亞所管的玻璃市、吉打、吉蘭丹、登嘉樓，往西控制了原英屬緬甸的撣邦。泰國參與日本所推動的大東亞共榮，也派泰軍力阻中國遠征軍在緬甸的進擊，然而當東亞戰局逐漸對日本不利時，泰國亦透過管道試圖與盟軍聯繫，其中一條線索就是透過重慶國民政府所控制、駐紮在雲南南部的中央軍傳遞訊息。關於這段期間的研究，目前僅得陳鴻瑜所著《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一書，在其泰國篇章中提及中泰間在抗戰期間的外事往來，但關於軍事衝突的部分談得較少。⁵

本文將利用藏於國史館的《蔣中正總統文物》、《陳誠副總統文物》，搭配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所藏特種檔案以及其他已出版的方志資料、回憶文件等建構全文。不僅要談抗戰期間泰國與國軍間的衝突，也試著利用史料理出脈絡，追索泰國欲透過國軍向重慶國民政府傳遞訊息的嘗試，試圖填補抗戰期間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在中泰間由國軍居間的這一缺塊。順帶一提，1939年暹羅為了推展其泛泰主義，將國名更改為泰國，因此本文敘述時，如當時國名為暹羅，便以暹羅稱之，如已更名為泰國，便以泰國稱之。本研究的限制，在於筆者無法利用泰文資料佐證泰方的動作及其動機，或能留待往後有其他學者加以補足。

貳、抗戰初期暹羅的態度

1931年九一八事變在中國東北爆發時，暹羅還處於完全的君主體制，當時的君王是拉瑪七世（Lama VII）巴差帝帕（Prajadhipok），中暹間並無外交關係，甚至連領事關係都沒有，也沒有雙方透過外交代表簽署的約款。⁶ 這是因為暹羅

⁵ 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臺北：鼎文書局，2000年），頁307-418。

⁶ 直到1933年1月，為了商貿的便利，國民政府才獲准在曼谷設置商務委員辦事處，僅能處理商務貿易事務，不能兼領僑務，因此形式上雖是官方機構，但只能說是半個領事館。而相對的，暹羅所派的商務官僅駐節香港，在中國本土並沒有駐地。參見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頁315-316。

當局顧慮到其境內華僑眾多，且多掌握經濟命脈，如允許中方在暹羅境內設立外事機構，或將影響暹羅推動的泰化政策。此外，中國在革命之後採共和政體，在暹羅華僑也曾受辛亥革命影響發起推翻皇室的反動，都讓暹羅對華深具戒心。⁷反觀日暹間自1897年起便建立外交關係，1899年便互派公使。⁸就外交關係上來說，暹羅與日本確實比中國親近得多，對日本的態度也比對中國親近了些。九一八事變就是一樁顯例。國民政府透過國際聯盟尋求國際輿論聲援，《李頓調查團報告書》提交大會討論時，暹羅代表並未在大會討論中針對該報告書發表意見，但在該報告書是否通過的投票中表了態。⁹1933年2月24日，國聯成員國在大會投票，贊成通過《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有42國，僅日本反對，智利缺席，而暹羅則投下了唯一一張棄權票。¹⁰

暹羅代表對李頓報告的投票行為有其脈絡可循，一方面是基於日暹間緊密的關係而來，一方面是基於暹羅國內政局的改變所帶來的影響。1932年6月24日，暹羅爆發憲政革命，頒布憲法，推動君主立憲，自此暹羅一變而為內閣制國家，而且也是一個立法反共的國家。¹¹首任總理瑪奴巴功（Phraya Manopakorn Nititada）在任期間，於1933年4月通過嚴格的反共法令，只要受指為共黨，便有可能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逮捕而驅逐出境，此舉雖可能壓制共黨帶來的變亂，但由於他難以擺平國內保皇勢力與一般人民勢力的衝突，仍在1933年6月政變中

⁷ 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頁309-310、330。

⁸ 日本駐暹首任代理公使為稻垣滿次郎，派駐時間是1897年3月31日，1899年11月19日扶正，擔任首任駐暹羅公使；暹羅駐日首任公使為Phya Rithirong Ronachet，派任時間是1899年10月19日。參見〈付錄〉，外務省日本史料館、日本外交史辭典編纂委員會編，《日本外交史辭典》（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年），頁74、147。

⁹ “Records of the Special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Vol.3,” in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Special Supplement No.111, 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1933.

¹⁰ 宮崎申郎，「矢田部公使ノ對暹工作」，〈諸外国内政關係雜纂：暹羅国ノ部〉，第2卷，《戰前期外務省記錄》，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B02031580000，REEL No.642，p.391；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2冊（北京：新華書店，1983年），頁181；伊香俊哉，《滿州事變から日中全面戦争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年），頁46。

¹¹ Christopher John Baker, Pasuk Phongpaichit, *A History of Thai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116-119；朱振明，《泰國：獨特的君主立憲制國家》（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版），頁111。關於泰國此次頒行的憲法，中譯本可參考曼谷日日郵報，王又申譯，《暹羅現代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頁142-151。

黯然下台，由政變領袖披耶拍鳳（Phraya Phahon Phonphayuhasena）上將組閣。披耶拍鳳延續反共法令，並且在國土被英法兩國包夾的情況下，與日本更形親近，不僅採買日本軍械，也派遣留學生赴日學習，敦聘日本軍事教官訓練泰國軍隊，與日本在反共立場上接近，雙邊貿易關係亦頗密切，1936年時日暹貿易占暹羅貿易總額的1/4，僅次於英國，使得暹羅很自然地支持日本在東亞的擴張。¹²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不久，暹羅以日本封鎖中國海岸為辭，將駐香港商務專員撤回。¹³ 同年八一三淞滬會戰後三日，暹羅為了阻撓華僑向國內捐輸與匯款，頒布「統制募款條例」14條。隔年2月12日，曼谷政府以共黨嫌疑為辭，逮捕學界、商界華僑共22名，多人遭審判後驅逐出境，爾後華僑遭逐的事情時有所聞。¹⁴

另一個促使泰國親近日本立場的關鍵，在於暹羅與英法間的領土糾紛。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擴張，自19世紀下半越形侵逼，先在1867年逼迫暹羅承認屬地柬埔寨轉為法國的保護國，復於1893年壓迫暹羅割讓湄公河左岸土地，並經過數度邊界調整，直到1907年暹法間的邊界才算底定，至此暹羅失地面積達46.7萬平方公里，這都使得暹羅產生對法國的厭惡感，也使暹羅深盼能奪回湄公河以西失土。¹⁵ 此外，暹羅為了擺脫列強加諸的不平等條約以及領事裁判權，於1909年不惜以割地的方式，割玻璃市、吉打、吉蘭丹、登嘉樓予英國，讓英國同意撤廢在暹領事裁判權，並提供4百萬英鎊貸款用以興建曼谷到馬來亞的鐵路。¹⁶ 失去南方領土，也令暹羅惦念不忘。

一戰期間，暹羅兩度派兵前往歐洲西戰場協同協約國作戰，在巴黎和會中暹

¹² Maurizio Peleggi, *Thailand: The Worldly Kingdo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7, pp.120-124。關於日泰民間往來及商貿，可參考村嶋英治，《海外における日本文化の受容に関する実証的研究：タイとその周辺地域の事例》（東京：統計研究會，1992年），頁50-53；蔡文星，《泰國》（重慶：正中書局，1943年），頁61-62；俠文，《暹羅內幕》（香港：南洋問題研究會，1940年），頁16-17。

¹³ 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頁323。

¹⁴ 蔡文星，《泰國近代史略》（重慶：正中書局，1944年），頁132-133。

¹⁵ Ronald Bruce St. John, *The Land Boundaries of Indochina: Cambodia, Laos and Vietnam*, Durham: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Durham, 1998, pp.15-18.

¹⁶ "Treaty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Siam(1909)," in *Treaty Series*, No.19, London: Stationary Office, 1909.

羅以戰勝國的姿態，呼籲其他協約國與暹羅簽訂平等新約，於是美國（1920年10月16日）、法國（1925年2月14日）、荷蘭（1925年6月5日）、英國（1925年7月14日）、葡萄牙（1925年8月14日）、義大利（1925年8月26日）陸續與暹羅簽訂新約，廢除治外法權，使暹羅取得司法獨立地位。¹⁷ 然而約款的對等，卻沒助成暹羅奪回失土，1938年12月接替披耶拍鳳擔任泰國總理，持續親日政策的鑾披汶（Phibunsongkhram）對此亦心心念念。待1939年8月間，歐洲戰端將開，法國為了避免在東亞仍需分心擔憂法屬印度支那安危，盼能與泰國〔按：暹羅於1939年後改稱為泰國〕簽訂互不侵犯協定，但泰國要求法國必須重新劃定法泰邊界，因此法國被迫同意讓出湄公河以西區域，雙方於1940年6月12日在曼谷簽字。¹⁸ 同一天，基於與法國類似的考慮，英國的代表也在曼谷與泰國簽署了互不侵犯條約。¹⁹ 英泰間的約款順利地在同年8月31日換文生效，然而法泰間的約款卻命運多舛，法國政府同意與泰國簽字的時點，正是德國發起閃電攻勢進逼巴黎之時，無法抵擋德國的法國，於1940年6月17日於巴黎簽署城下之盟，這也使得法泰間的約款雖經雙方代表簽署，但泰方無意批准，更談不上換文生效。²⁰ 值得注意的是，泰國與英法簽約當天，也與日本在東京簽署了確認友好關係存續與尊重彼此領土的條約，約定如簽約一方遭受第三方攻擊時，簽約之另一方不會支援第三方。²¹ 英法日泰四國以約款交互牽制，是因為此時在中越交界一帶戰況所引發的連續反應。

1940年6月，重慶當局在桂南會戰接連丟失南寧、龍州與鎮南關等要地，法國在德國的攻勢下投降，法屬印度支那失去了殖民母國的奧援，暴露於日本的武裝威脅之下，只好投向屈居軸心國麾下的維琪政府。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總督卡特魯（Georges Catroux）迫於日本的要求，於1940年6月20日切斷滇越鐵路的

¹⁷ 此處由匿名審查人指點，特表謝意。

¹⁸ 謝猶榮，《暹羅國志》（南京：國家圖書館，1948年重印），頁156-157。

¹⁹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ailand Treaty of Non-Aggression. Signed at Bangkok, June 12th, 1940 <1941> LNTSer 28; 203 LNTS 421.

²⁰ Robert Cryer & Neil Boister eds., *Documents on the Tokyo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469-470.

²¹ Japan and Thailand Treaty concerning the Continuance of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Mutual Respect of Each Other's Territorial Integrity. Signed at Tokyo, June 12th, 1940 <1941> LNTSer 37; 204 LNTS 131.

運輸，並允許日軍軍官於海防檢查通過的貨物。²² 日本為求窒息偏處西南的重慶國民政府，又壓迫英國在同年7月封鎖滇緬公路三個月，兩路齊斷，加以日本封鎖香港，運補中國的物資難以進入。²³ 1940年9月，繼任的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總督德古（Jean Decoux）為求法屬印度支那不被日本直接占領，乃與日本簽署協議，同意日軍為配合對華作戰的進行，可利用法屬印度支那治下的三處空軍基地（富壽、嘉林、老街），自海防登岸，為數六千以下的軍隊得以獲准通過。²⁴ 自此，日軍執行其「佛印進駐」，經常派機轟炸滇越邊境，常殃及滇越鐵路；重慶國民政府也為避免日軍藉由滇越鐵路運兵進擊雲南，在日法簽署協議後不久，便命國軍炸毀河口鐵橋，拆毀約八十公里的鐵軌，放棄這條通路。²⁵

泰國在日本勢力擴張至法印後，仍念念不忘規復湄公河以西失土，日本基於日後南進或也需要泰國之助的考慮，居間協調法泰邊境問題，於1941年1月協助泰法簽署協議，商定由日法泰三方組織混合勘界委員會，重訂湄公河國界。²⁶ 在

²² 「國民政府對法國封鎖滇越鐵路等事件聲明」（1940年6月23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外交」》（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632-633；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336-337。日方派出的是西原一策少將等40人，參見許文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中、日、法在越南的交涉與衝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4期（2004年6月），頁78。蔣中正為避免交通閉鎖帶來的不利影響，特命駐河內西南運輸總處主任宋子良往見法屬印度支那聯邦總督德古，商議軍事合作問題，惟內容並不清楚。詳見秦孝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4卷（下）（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年），頁548。

²³ 「國民政府對英國封鎖滇緬路聲明」（1940年7月16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外交」》，頁575-576；吳圳義，《邱吉爾與戰時英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頁1-28。

²⁴ 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頁88-89；「佛印問題爾後的措置に關する件」（1940年9月13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冊（東京：原書房，1966年），頁454-455。徐永昌為了確保存越物資，特要求搶運，詳見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5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頁401。

²⁵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4冊，頁497；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5冊，頁414。其材料似乎移往修築敘昆鐵路及滇緬公路，詳見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6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頁205。

²⁶ 「對佛印、泰施策要綱」（1940年1月30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冊，頁479-480。

日方居間的情況下，1941年5月9日，法泰雙方在東京簽訂和平條約（Convention of Peace between Thailand and France），法國將馬德望和暹粒兩省割讓給泰國；並將湄公河右岸寮國土地歸還泰國。日本此舉的目的，在獲得泰國首肯借道，以便直攻馬來半島，但泰國並未直接應允，反試圖保持中立，僅在外交承認上，於1941年8月5日宣布承認滿洲國以回應日方壓力，這頗令日本不耐。²⁷ 待日本於1941年12月發動珍珠港事變，並揮軍大舉南侵東南亞時，日軍由鄰近的法屬印度支那與暹羅灣入侵泰國，泰國軍隊經過短暫的抵抗之後就屈服了，在日本的主導下，投入軸心國陣營並與日軍合作，日泰間簽署為期十年的同盟協定。²⁸ 自此，泰國成為日軍在東南亞擴張的主要跳板之一，而日本也回饋泰國奪回其所聲稱擁有主權的領土。



圖1、1941年後併入泰國領土圖

資料來源：Ronald Bruce St. John, *The Land Boundaries of Indochina: Cambodia, Laos and Vietnam*, p.20.

²⁷ 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頁328。

²⁸ 「日本國「タイ」國間同盟條約」（1941年12月21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冊，頁575。

叁、中泰的軍事衝突

抗戰期間，中日兩國在華南的交鋒不算多，比較關鍵的有1938年10月的廣州戰役、1939年2月的海南戰役、1939年11月的桂南會戰等，日本所圖為切斷重慶方面的運輸補給線。肩負與日軍相抗責任的，以第四戰區何應欽（1938年廣州之役後改由張發奎接任）與雲南省主席龍雲所部為主。原本國軍在國境南緣的重點是在中越邊境，以幾個口岸為重點，尤其是河口、鎮南關、東興等處交通要道，原以戰力相對較弱的地方軍隊或是少數土兵駐防，日軍執行「佛印進駐」後，中國南緣邊境門戶大受威脅，終於爆發桂南會戰，這場戰役是中央軍進入中國國境南緣的一次契機。然隨著滇緬公路開通，日軍占領南寧，切斷盟軍物資供應鏈的戰略意義喪失，方分道自桂南撤離，一部由龍州經鎮南關撤入越北同登，一部由廣東欽縣乘船轉赴上海，日軍前後占領桂南一年有餘。²⁹ 是役使得白崇禧、陳誠被降級，徐庭瑤、葉肇、陳驥等將領遭撤職查辦。

重慶國民政府在珍珠港事變爆發後，跟隨美國腳步，於1941年12月9日對日宣戰，復於同月11日對德、義宣戰。軸心國的成員不只日、德、義三國，但重慶國民政府正式宣戰的對象僅此三國。泰國在日本的威迫下參與軸心國，但因日本已於1940年扶植汪精衛政權為「正統」，另立南京國民政府為「中國」之代表，不復承認重慶國民政府，因而所有軸心國其實都沒有對重慶國民政府宣戰。泰國沒有對重慶國民政府宣戰，而重慶國民政府也沒有對泰國宣戰。然而重慶國民政府為了增強國境南緣的防衛力量，選擇中緬越邊境的西雙版納地區加強防務，調入中央軍進駐，這區域也是中國國土距離泰國最近的一塊地區。當暹羅於1939年將國名改為泰國時，大有高揚泛泰主義（Pan-Thaism）的企圖，塑造唐代的南詔為泰族歷史一部分的論述，因而也將西雙版納地區視為失土，圖規復該地，以恢復大泰榮景。³⁰ 這都使得重慶當局深覺有添駐中央軍以維國境南緣安全的必要。

²⁹ 黃旭初，《黃旭初回憶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離合》（臺北：獨立作家，2015年），頁238。

³⁰ 謝世忠，《國族論述：中國與北東南亞的場域》（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年），頁110-111。重慶國民政府對此的反駁，可參考王連浩、陳勇，〈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及知識界對大泰族主義之回應〉，《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

進駐西雙版納地區的中央軍，是國軍第六軍九十三師。惟此處的第六軍與抗戰初期由韓復榘所轄的第六軍並無淵源，而是以第五軍九十三師為基礎，在1938年年中擴編而成的，軍長為黃埔一期的甘麗初。九十三師編成時間為1937年，師長為黃埔二期出身的呂國銓。該師編成時有步槍3,900枝，機槍121挺，重機槍93挺，迫擊砲24門，有一專屬砲兵營，是第六軍中戰力最強的一個單位，下有二七七、二七八、二七九等三個團。³¹一開始該軍隸屬第三十二軍團，投入武漢會戰，後移調廣西，接著為了因應日軍可能向雲南邊境突入，乃於1941年11月12日由二七七團團長李友尚派劉觀龍為指揮官，率一部分二七七團組成之加強團，由雲南開遠出發進駐雲南佛海（今勐海）縣，該團以二七七團為主幹，增列3個步兵連，並配屬工兵戰車防禦砲各1排，無線電1班。³²

九十三師二七七團之加強團進駐佛海的本來目的，是應英國要求協防緬甸的，因而一開始在佛海還有許多中英雙方所派的軍事參謀進駐。但不久後，珍珠港事變爆發，泰日結盟，日軍進襲緬甸的態勢相當明確，二七七團奉命自佛海進入緬境，於1941年12月22日抵達猛勇（Mong Yawng）待命。同月16日，九十三師師本部、二七八團、二七九團自開遠開拔往西雙版納移動，於1942年1月23日抵達佛海，隨即應英軍要求前往緬北景棟（Kengtung）接替英軍防務。³³由是二七七團續往猛叭（Mong Hpa Yak），接替英軍自猛叭到大其力間的防務，二七八團自車里經大猛龍進駐猛勇接替二七七團，二七九團由佛海出猛麻至景棟。³⁴不久後，同古被占，入緬的第五軍二〇〇師後撤，同古往毛奇的公路也被占領，

第3期，頁86-95。而中央研究院於1928年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所時，在院長蔡元培的支持下於該所下設民族學組，蔡元培自任組長兼研究員，將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調查也納入計畫之中，至抗戰期間也持續推動西南少數民族的調查工作。

³¹ 軍政部調製，「第一期整理部隊番號及統計表（附編成單位表）」（1939年5月），〈陸軍整備（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69-004；「摘報檢查獨立砲兵關於各團概況表」（1939年7月），〈全面抗戰（十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103-00047-007。

³² 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臺北：作者自印，1984年），頁311-312；「陸軍第六軍緬甸戰役戰鬥詳報」（1942年8月），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志編纂委員會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志》，下冊（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頁920。李拂一原文提及二七七團出發地為廣東開平，或許有誤，研判可能為雲南開遠。

³³ 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頁312、317-318。

³⁴ 方國瑜，〈抗日戰爭滇西戰事篇〉（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19-20。

日軍繼續往北，中日雙方於毛奇、雷高一帶續戰。

九十三師二七九團（缺第三營）與暫編五十五師、四十九師一四六團（缺第一營）等部隊，一同參與毛奇雷高之戰。二七九團第三營當時撥入河滂（Hopong）、猛滂（Mongpaw）附近，與四十九師一四六團第一營、一四七團第三營、砲五十二團第五連之一排、砲五十五團第十連擔任策應。二七七團在猛叭、二七八團（缺一營）在昆興抵禦。對手是日本十八師團、久留米師團四十八聯隊、五十五師團與泰國第一師、第四師。雙方自1942年4月6日接戰，到5月19日雨季來臨，戰鬥結束，因戰爭結果對國軍不利，第一次中國遠征軍決定後撤返回國境。³⁵ 九十三師所部負責在薩爾溫江掩護其他國軍後撤，但二七七團僅餘半數，二七八及二七九團都不及半數，掩護起來相當吃力。³⁶ 這是國軍第一次與泰國部隊交火的紀錄。

第一次國軍入緬作戰失利後，九十三師撤回雲南佛海，之後便以車里、佛海、南嶠一帶為主要防區。與九十三師一同撤往西雙版納地區的還有四十九師與暫編五十五師，兩支部隊一度在車里布防整理，不久後便開往思茅，而後四十九師留在思茅，暫編五十五師轉往昆明整補。³⁷ 泰軍仗著日軍威勢，以為已經打擊了國軍，泰軍第三師由指揮官乃屏指揮，透過土民領路，於1942年6月5日進占景棟城，與九十三師二七九團所派遣之游擊部隊對峙於打丙江。³⁸ 同月11日，泰軍第一師約2千餘名，搭配飛機7架，進襲打丙江岸國軍游擊部隊未果，反於同月16日遭國軍反攻潰敗，泰方復派泰軍第三師搭配日軍約3千餘人續攻，國軍亦加派

³⁵ 「陸軍第六軍緬甸戰役戰鬥詳報」（1942年8月），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志編纂委員會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志》，下冊，頁920-929。

³⁶ 「甘麗初電蔣中正」（1942年5月20日），〈八年血債（五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200-00077-307。

³⁷ 思茅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思茅地區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375；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志編纂委員會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志》，下冊，頁1038。

³⁸ 「甘麗初電蔣中正」（1942年5月27日），〈遠征入緬（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5-00008-140；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頁323-324。甘麗初拍回的電報中，稱前線士兵聽到敵軍中有操粵語的偽軍人員，可參考「甘麗初電蔣中正」（1942年6月13日），〈遠征入緬（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5-00008-151。

二七七團增援打丙江北岸。由於國軍沿岸布防，泰軍進襲必須泳渡，國軍乃配機槍於泰軍渡河至半時開火，未能除盡而登岸者，便開始肉搏戰，雙方互有勝負，國軍在同月28日自打丙、蠻南乜等地猛攻，於次日擊退泰軍。此役國軍宣稱斃敵2千餘，擄獲山砲1門、馬15匹、步槍30餘枝，手榴彈數千，子彈10餘萬發，另有罐頭食品，國軍方面傷亡人數亦達400餘人。³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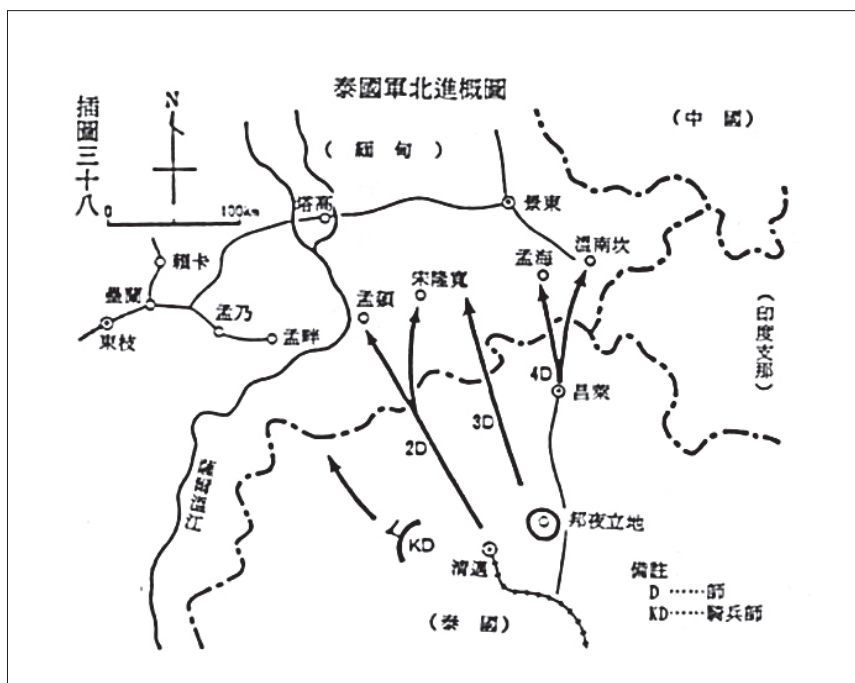


圖2、泰軍北進英屬緬甸圖

資料來源：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年），頁482。

此前中泰接火的地點，實際上位於緬境。泰國所持口號是為了收復大泰失土撣邦，但因國軍阻擊屢攻不下，便在1942年12月調集其國內第一軍所轄第一至第三師搭配日軍、砲兵及飛機，於11日以步兵千餘拂曉強渡南累河，與國軍九十

³⁹ 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頁331-332。

三師二七八團一連交火，因泰日聯軍人數眾多，國軍雖增派一營支援，仍無力反攻，僅能退守大猛龍。⁴⁰

1943年1月，泰軍偷渡打丙江北攻，竟攻入中國國境的小勐宋、南凍、打洛、58號界樁等地，企圖進擊車里，奪下西雙版納。國軍在同年2月發起反攻，由九十三師副師長彭佐熙親往大猛龍督軍，將泰軍驅出境外，中泰再度呈現對峙的局面。⁴¹幾度與泰軍交鋒，使得九十三師人員損失頗重，為持續防堵泰軍北進，自1944年1月起至8月止，陸續增補充員新兵六次，昆明共分派13,900員，但死亡、逃逸者竟達10,474名，送達駐地分撥的僅3,426名，即實際充員者只有所派人數1/4弱，且抵達駐地之新兵多衣不蔽體、身體虛弱，甚至還必須持杖而行，否則難以前往陣地。⁴²如此慘況實在無法達到增補兵員的目標，呂國銓為了因應此一情況，也曾再電要求增撥兵力，所求其實不多，僅要一團，可見前線之捉襟見肘。⁴³

美國為了協助國軍訓練工作，由美軍總部派遣負責中印緬戰區作戰訓練的佛蘭克（Frank Dorm）上校於1944年11月前往佛海，視察九十三師的訓練考察工作，並提供指導。⁴⁴此行，似留有一名美軍上校魏德（Wade）在當地協助訓練及裝備工作，恰逢日軍有增派一師兵力進駐景棟且進擊的可能，呂國銓乃再請支援，並轉守為攻。⁴⁵1945年1月，九十三師縮小防守面，轉採攻勢，於同年2月1日由二七八團自大猛龍發起攻勢，往景南、勐瓦、什南進擊，將泰軍逼至南累河

⁴⁰ 「龍雲電蔣中正」（1942年12月23日），〈八年血債（五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200-00077-085；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頁339-340。

⁴¹ 「衛立煌電蔣中正」（1943年1月24日），〈遠征入緬（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5-00009-308；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頁341-342。

⁴² 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頁348。

⁴³ 「衛立煌電蔣中正」（1944年3月9日），〈遠征入緬（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5-00009-208。

⁴⁴ 關於佛蘭克的相關工作項目，可參考“Protection of American lives and property in China and representations regarding bandit attack upon a United States Army convoy in Yunna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pp. 716-726.他的資料目前存於美國胡佛研究所，可參考http://www.oac.cdlib.org/findaid/ark:/13030/tf8f59n9h7/entire_text/（2018/3/6點閱）。

⁴⁵ 「衛立煌電蔣中正」（1944年12月23日），〈遠征入緬（四）〉，《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5-00009-446。

西南岸。⁴⁶ 魏德在此次進攻結束後，於同年3月中離開佛海，轉往保山。⁴⁷ 此次進擊，呂國銓回報擊退進犯勐嘎、坤博之泰敵的經過，上呈至蔣中正，報告稱擊傷50名，但並未追擊。⁴⁸ 泰軍離開中國國境南緣，大概要到1945年4月底，英軍游擊隊由大勐養推進至勐麻，盤據打洛、勐麻一帶之泰軍不戰而退，九十三師於同時進駐打洛，但往勐麻移動時遭英軍拒絕。⁴⁹ 至此，國軍與泰軍間的武裝衝突才算結束。

肆、中泰軍隊的秘密往來

1930年代在總理鑾披汶的推展下，泰國高舉泛泰主義，推動法西斯主義，希望國富民強，並拉攏較能達成此一目標的日本，但仍積極想要維持中立地位。直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後，才在日方的壓力下與之同盟，並於1942年1月25日對英美宣戰，在同年7月7日宣布承認汪精衛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雖雙方僅有外交代表，並未派有大使，但曼谷與南京間的相互承認，更強化了以東京為核心的大東亞共榮圈。⁵⁰ 而反對泰國官方對盟軍宣戰的泰國人士，自組「自由泰運動」，除了在英美兩地推動外，也曾派遣人員前往重慶，試圖建立與重慶國民政府的聯繫。⁵¹ 這部分在陳鴻瑜及李道緝的研究中已經談了許多，本文不再贅述，而關於自由泰運動與鑾披汶是否為演雙簧，也曾經有學術著作加以討論，因此本文也不

⁴⁶ 「衛立煌電蔣中正」（1945年2月7日），〈遠征入緬（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5-00010-374。

⁴⁷ 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頁349-350。

⁴⁸ 「衛立煌電蔣中正」（1944年2月28日），〈八年血債（六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200-00087-204。

⁴⁹ 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頁350。英方與國軍的合作，常為國軍懷疑毫無誠意，1945年1月有一泰國逃兵遭英軍俘虜，送往南嶠機場，國軍探知之後希望調訊該員，卻受到諸多阻撓，而英機利用機場並未通報，對國軍頗不尊重。詳見「衛立煌電蔣中正」（1945年1月29日），〈遠征入緬（五）〉，《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5-00010-350。

⁵⁰ 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頁329-330。

⁵¹ 關於自由泰的相關活動，可參考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頁333-390。

再重複，僅著重於中泰間透過九十三師所牽線的秘密聯繫。

一、鑾披汶當政時

當日本於1943年年底起，在太平洋戰場上逐漸趨於劣勢後，在「自由泰運動」之外，泰國也試著透過其他渠道與盟軍聯繫，除了政治渠道之外，軍事渠道或許也是釋放消息的選擇。由於九十三師駐防中、緬、越三國邊界，為最接近泰國的國軍部隊，且為中央軍，就成了中泰間軍事溝通的管道。⁵² 這管道的開啟，緣於一通九十三師截聽的電報，時間落在中泰兩軍對峙之時。

1943年2月18日，九十三師師長呂國銓電報第六軍軍長甘麗初，稱截聽泰皇對泰軍第一軍密電，內容提及日軍進駐曼谷後，壓迫泰軍進攻緬甸，傷亡慘重，因此希望第一軍軍長在最短期限內與國軍接觸，磋商停止戰鬥事宜。該電報內容經甘麗初上呈，蔣中正接到電報後，僅表示要抄知軍令部辦理。⁵³ 然而奇怪的是，此時泰皇移居瑞士，國內由攝政王普里迪負責，因此或許不是由泰皇親自指示，若是由與自由泰有所往來的攝政王發出指示，雖有可能，但因軍方聽命於鑾披汶，自鑾披汶處發出亦有可能。筆者並無泰文資料佐證，無法考訂細節，僅能就呂國銓獲此訊息知道泰方高層有此意圖，而該份指示出於何方，實難確知。⁵⁴

軍事委員會獲得蔣中正指示後，先發電通知龍雲與呂國銓，對泰軍要求聯繫事應嚴密警戒，與泰軍的聯繫屬於秘密，儘量不用無線電，以免電碼被日軍破譯，使得秘密接觸曝光。⁵⁵ 軍令部另派一名何姓參謀前往泰國邊境談判，並報稱，泰軍已向泰皇〔按：實際上可能是攝政王〕請示和平方針，泰國專使預定在2月28日攜帶和平條件與我方談判。⁵⁶

⁵² 「遠征軍在反攻準備期間守勢作戰指導案」（1943年10月12日），〈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三）〉，《陳誠副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70-014。

⁵³ 高素蘭編，《事略稿本》，第52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頁540-541。

⁵⁴ 此處獲得匿名審查人提點，特別致謝。而關於泰皇往瑞士避居，可參考陳鴻瑜，《泰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5年），頁247。

⁵⁵ 「蔣中正電呂國銓」（1943年2月20日），〈對韓菲越關係（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0010-409。

⁵⁶ 高素蘭編，《事略稿本》，第52冊，頁667-668。

因緣恰巧，泰國方面向重慶當局提出和平訊息後，蔣中正醞釀了近一年的對泰談話，終於在1943年2月27日以〈告泰國軍民書〉的公開談話發表了。⁵⁷該談話中，蔣中正以國際局勢逐漸對軸心國不利，呼籲泰國當局趕緊自救，基於中泰友誼已逾千年，當下泰國遭到日本脅迫，重慶當局基於三民主義中扶助弱小民族的信念，對泰國並無領土野心，而且深知泰國是遭到日本脅迫，因此從未視泰國為敵國，攻擊的對象絕非泰國軍民，而是日本的武力，期望泰國軍民起而反抗日本，一同加入同盟陣營與國軍並肩作戰，從而爭取戰後在國際間發聲的機會。⁵⁸自珍珠港事變爆發後，這是蔣中正第一次公開對泰國發聲，時間落在泰國投入軸心國陣營一年多之後，一般民眾或許並不清楚蔣中正為何在此時公開對泰國當局喊話，但如果搭配上呂國銓向上傳遞的訊息，或許能揣測，這是蔣中正對泰國當局友善的回應。

就在九十三師居間傳遞曼谷盼與重慶建立聯繫之時，泰軍也試著與國軍在對峙期間溝通，或是建立管道，而泰軍第一軍也向國軍傳達希望停戰的意願。⁵⁹呂國銓於1943年3月19日電報龍雲，泰方由勒博拉乙上校為代表，表示願提供情報，若有對日作戰計畫亦請轉知，泰方對日本的再度壓迫已有覺悟云云。⁶⁰在蔣中正的信任下，呂國銓除了必須固守國境南緣之外，還獲得授權負擔與泰方秘密溝通的任務。⁶¹

⁵⁷ 關於蔣中正對泰廣播，初始透過駐英大使顧維鈞與駐美大使胡適於1942年4月間徵詢過英美雙方，皆表示歡迎，美方還參酌了內容的修訂，然而我方認為泰國必受日方脅迫才對英美宣戰，應視為被占領國而非敵國一詞，美國並不認同，但我方不願修改，為免令美方不快，蔣中正乃指示緩辦對泰廣播，直到1943年的此時才正式透過廣播發布，初稿之基調與蔣中正最後發表的內容相差甚微。可參考「對泰國宣言事」（1942年4月至8月），〈一般外交（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80106-00076-002。

⁵⁸ 「告泰國軍民書」（1943年2月27日），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32卷（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4年），頁25-27。

⁵⁹ 「龍雲電蔣中正」（1943年2月22日），〈對韓菲越關係（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0010-412。

⁶⁰ 「龍雲電蔣中正」（1943年3月22日），〈對韓菲越關係（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0010-415；「蔣中正電呂國銓」（1943年6月6日），〈對韓菲越關係（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0010-417。

⁶¹ 「蔣中正電甘麗初」（1943年6月15日），〈對韓菲越關係（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0010-418。

或因呂國銓得到層峰授權，在哈斯曼（John B. Haseman）的書中，提及了一段中泰兩軍高層在1944年上半年間的一段會面紀錄。⁶² 1月5日，泰軍第三師師長宋克巒（Luang Han Songkhram）少將派了三名代表，攜帶白旗越過中緬邊境的藍姆河會見九十三師師長，此次會面鑾披汶知情，並於同年3月再度派遣宋克巒組織代表團往見九十三師人員，4月2日由中泰兩軍代表舉行會談，達成了幾點協議：1.泰國要求英美與自由泰通知在中國的泰國代表出席會議；2.中泰相互通信；3.中泰同意停止涉及軍事事務的越界行動；4.泰國請求盟軍轟炸機僅攻擊泰國境內的日軍目標；5.泰國代表獲悉盟軍將規劃一場針對馬來亞與泰國的陸海軍行動，盟軍司令答應告知泰國行動發起的時間。⁶³

此外，陳鴻瑜引用了雷諾德茲（Edward B. Reynolds）的說法，提及普里迪曾在1943年1月底秘密前往泰北，要宋克巒釋放4名國軍戰俘，請他們攜帶一封信，信中傳遞泰國被迫與日本結盟的信息，國軍方面友善以待，因而自1943年2月中旬起，雙方同意每15天舉行一次會晤。⁶⁴ 但如會晤如此頻繁，想必多少會遺留一些資訊，不過就國史館與國防部所藏資料翻查，並未得見相關資料，因此對這樣的會晤安排，還需要輔以泰方資料佐證，才有可能探明真相。

比較能確定的是泰方仍希望透過九十三師傳遞消息給重慶，再轉給其他盟國。泰方於1944年6月去函呂國銓，一方面希望重慶當局提供驅逐機200架，並表達加入盟軍意願，也希望告知盟軍未來反攻時在泰境所需機場地點，泰軍願意加入反攻行列。然或許泰方態度曖昧，因此我方並未告知盟軍反攻的計畫，對泰國防範亦多。泰國方面對於盟軍反攻密支那卻沒告知，覺得並不被視為盟友，更希望中方能轉知盟國反攻的計畫內容。⁶⁵

⁶² 依照哈斯曼在1978年出版的書中所記，1944年上半年，中泰兩軍高層的會見，在中方看來是九十三師的師長出面，但在他的書中卻稱該師師長名字為Lu Wi Eng，階級為準將（Brigadier General），然而實際上，該師師長為呂國銓，如該次會面為真，那中方可能採用假名。不過，此次會見，僅有哈斯曼的研究中談到，因此關於該次會談的真偽以及過程，或許還有考訂的必要。詳見John B. Haseman, *The Thai resistance movement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8, p.62.

⁶³ 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頁339-340。

⁶⁴ 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頁341。

⁶⁵ 葉惠芬編，《事略稿本》，第57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頁225-226。

二、美軍密遣情報人員入泰

在盟軍醞釀反攻緬甸時，美國戰略服務署也在1944年1月由重慶遷往昆明，其中一部分人員進駐思茅，在重慶接受美國訓練的泰籍情報人員也隨之遷往昆明，爾後轉往車里，進入九十三師防地。他們在2月與4月，分兩批經寮國進入泰境，除了不知所蹤者外，其他都遭到泰國憲警逮捕。⁶⁶ 雖則九十三師防地與泰軍對峙，自其防區入泰應是自中國進入泰國最直接的道路，但這批情報人員仍是繞道寮國，自法屬印度支那進入泰境，並未透過中泰雙方建立的軍事渠道轉入，或也能見當時中泰雙方深切的不信任。

三、鑾披汶下台之後

1944年7月29日，泰國國會否決鑾披汶關於遷都皮查汶（Pechabun），以及在泰北沙拉武里（Saraburi）建立佛教城市的提案，因這兩份提案受日方支持，卻在國會中遭到否決，迫使鑾披汶辭職下台，由庫恩（Khuang Aphaiwong）於同月31日接任首相。這或許是攝政王普里迪巧妙利用策略讓鑾披汶下台，以防日軍戰敗後，泰國被盟軍視為敵國而加以處置的權宜。⁶⁷

泰國於1944年10月復透過呂國銓轉達，將派6人代表團，著國軍軍服前往重慶，另有談判紀錄與日軍在泰國配置地圖寄送重慶，可惜在檔案中並未得見該項會議紀錄。⁶⁸ 然而，從檔案資料中看來，中泰前線軍隊雖然彼此有來有往，但1945年1月中泰軍隊仍在雲南邊境打了最後一仗，結果以泰軍全數被逐作收，可見即便中泰兩軍在前線有所接觸，但雙方的信任感還是很薄弱，畢竟泰國在日本的壓制下，雖透過「自由泰運動」與盟國在諸多地區接觸，卻未宣布脫離軸心國陣營，仍算是「敵國」。

1945年4月，當泰軍基本上已經被逐出中國國門之外時，呂國銓與泰軍之間

⁶⁶ 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頁341-342。

⁶⁷ 陳鴻瑜，《泰國史》，頁247-248。

⁶⁸ 「衛立煌電蔣中正」（1944年10月31日），〈對韓菲越關係（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0010-425。

的聯繫管道仍舊維持，就資料中所見，泰軍曾派員至九十三師處要求雙方擇期於打洛會商共同對付日軍的計畫。⁶⁹ 然該份文件中並無批示，因而也不能確定該次泰軍要求會面是否得到層峰批准。但之後泰軍已被逐出緬境，緬甸境內國軍防地改由英軍駐防，國軍亦退回界內，因而防區不再與泰軍接壤。⁷⁰ 直到戰爭全面結束前，在臺灣的資料中，不復見到任何中泰間透過九十三師這一前線部隊傳遞的訊息。

伍、結語

日本標舉的大東亞共榮圈，試圖排除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建立起以日本為中心的東亞秩序，但既然企圖作為東亞秩序的領頭者，就必須協助大東亞各地擺脫殖民帝國的桎梏，也必須滿足各大東亞範圍內各民族的期待——有的追求獨立，有的追求領土擴張，因而成為一個區域的調解者。抗戰期間的日泰關係就是一例，日本為了爭取泰國合作，也努力滿足泰國對於恢復失土的想望。然而泰國僅以泛泰主義的追求為目標，不盡然願意投身以日本為首的大東亞共榮圈，直到珍珠港事變爆發，泰國才被迫真正參與以日本為首的東亞秩序，並以泰日聯軍的方式，與國軍、英軍作戰。而國軍因為參與遠征軍的關係，也與泰軍駁火，泰軍甚至還曾一度侵踏中國國界。

在整個抗戰歷程中，泰國對中國而言是一個相當特殊的存在。一方面就重慶國民政府的立場來說，重慶與曼谷雙邊原本就沒有外交關係，也未彼此宣戰，但實際上雙方確有武裝衝突，交火的情況亦算激烈，範圍廣及緬甸北部到中國國界南緣。泰國出兵或許真有受到日本脅迫的部分，但也不無試著以泛泰主義為指導，規復她所宣稱的北方國土，亦即撣邦、西雙版納地區的意圖。泰軍的實力並不強大，第一次中國遠征軍期間，雖成功地擊敗了國軍，並與交火的國軍九十三

⁶⁹ 「何應欽電蔣中正」（1945年4月9日），〈對韓菲越關係（二）〉，《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0010-427。

⁷⁰ 「何應欽電蔣中正」（1945年6月29日），〈對英法德義關係（三）〉，《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90103-00013-203。

師對峙，但第二次中國遠征軍期間泰軍便開始不支，促使泰國政府考慮與盟軍聯繫。在中泰間沒有任何外交官、民間協會或是流亡政府得以居間的情況下，竟也透過對峙的國軍九十三師協助傳遞消息，希望搭上與盟國之間的聯繫，陳述遭迫與日本同盟的說詞，為自身在戰爭結束之後爭取較佳的待遇。雖然目前無法確知透過九十三師傳遞消息的，是否確由攝政王發動，但九十三師在如此情況下，成了與日泰聯軍交戰，以及與泰國秘密溝通的管道，確屬事實。

以往的研究少有將泰國納入中日戰爭的研究關懷裡，或許是因為泰國在戰爭結束之後，僅被視為是受日本脅迫而參與戰爭的國家，並未被視為戰敗國，且泰國政府長年反共，立場與戰爭結束後的南京國民政府及後繼的中華民國行憲政府接近，對於中泰間這段抗戰期間交火與溝通的歷史就不多談及。本文利用史料對此進行的拼湊，盼能對中國遠征軍在東南亞的活動，增益印緬之外的內容。

徵引書目

一、檔案、公文書

- 《陳誠副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遠征軍司令長官任內資料（三）〉。
《戰前期外務省記錄》（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諸外国內政關係雜纂：暹羅国ノ部〉，第2卷。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一般外交（三）〉
〈八年血債（五十三）〉。
〈八年血債（六十三）〉。
〈全面抗戰（十四）〉。
〈陸軍整備（四）〉。
〈對英法德義關係（三）〉。
〈對韓菲越關係（二）〉。
〈遠征入緬（三）〉。
〈遠征入緬（四）〉。
〈遠征入緬（五）〉。

二、史料集、條約集、回憶錄、日記

- 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32卷。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4年。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外交」》。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冊。東京：原書房，1966年。
朱法源，《孫立人言論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5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6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
周琇環、吳淑鳳、蕭李居編輯，《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史料彙編：中國遠征軍》。

臺北：國史館，2015年。

高素蘭編，《事略稿本》，第52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

黃旭初，《黃旭初回憶錄：李宗仁、白崇禧與蔣介石的離合》。臺北：獨立作家，2015年。

葉惠芬編，《事略稿本》，第57冊。臺北：國史館，2011年。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2冊。北京：新華書店，1983年。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ailand Treaty of Non-Aggression. Signed at Bangkok, June 12th, 1940 <1941> LNTSer 28; 203 LNTS 421.

Japan and Thailand Treaty Concerning the Continuance of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Mutual Respect of Each Other's Territorial Integrity. Signed at Tokyo, June 12th, 1940 <1941> LNTSer 37; 204 LNTS 131.

“Records of the Special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Vol.3,” in *League of Nations Official Journal*, Special Supplement No.111, Geneva: League of Nations, 1933.

“Treaty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Siam(1909),” in *Treaty Series*, No.19, London: Stationary Office, 1909

三、專書、叢書、志書、工具書

方國瑜，《抗日戰爭滇西戰事篇》。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4年。

外務省日本史料館、日本外交史辭典編纂委員會編，《日本外交史辭典》。東京：山川出版社，1992年。

伊香俊哉，《滿州事変から日中全面戦争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年。

朱振明，《泰國：獨特的君主立憲制國家》。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2版。

朱宏源，《孫立人上將專案追蹤訪談錄》。臺北：學生書局，2013年。

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志編纂委員會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志》，下冊。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

吳圳義，《邱吉爾與戰時英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

- 李拂一，《十二版納紀年》。臺北：作者自印，1984年。
- 村嶋英治，《海外における日本文化の受容にする実証的研究：タイとその周辺地域の事例》。東京：統計研究會，1992年。
- 俠文，《暹羅内幕》。香港：南洋問題研究會，1940年。
- 思茅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思茅地區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 秦孝儀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4卷（下）。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78年。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緬甸攻略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年。
- 曼谷日日郵報，王又申譯，《暹羅現代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
- 陳鴻瑜，《中華民國與東南亞各國外交關係史（1912-2000）》。臺北：鼎文書局，2000年。
- 陳鴻瑜，《泰國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5年。
- 齊錫生，《劍拔弩張的盟友：太平洋戰爭期間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1941-194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年。
- 蔡文星，《泰國》。重慶：正中書局，1943年。
- 蔡文星，《泰國近代史略》。重慶：正中書局，1944年。
- 蔣永敬，《胡志明在中國》。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年。
- 蔣永敬，《孫中山與胡志明》。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1年。
- 謝世忠，《國族論述：中國與北東南亞的場域》。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年。
- 謝猶榮，《暹羅國志》。南京：國家圖書館，1948年重印。
- 羅敏，《中國國民黨與越南獨立運動》。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 Baker, Christopher John & Pasuk Phongpaichit. *A History of Thai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Bruce St. John, Ronald. *The Land Boundaries of Indochina: Cambodia, Laos and Vietnam*, Durham: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Durham, 1998.
- Cryer, Robert & Neil Boister eds. *Documents on the Tokyo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Haseman, John B. *The Thai resistance movement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78.

- McLynn, Frank. *The Burma Campaign: Disaster into Triumph, 1942-4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Mitter, Rana.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1937-1945*, Lond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 Peleggi, Maurizio. *Thailand: The Worldly Kingdom*,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7.

四、期刊論文、專書論文、會議論文

- 王文隆，〈重慶國民政府與戴高樂政權間的雙邊關係（1941-1943）〉，收入唐啟華、張啟雄、川島真、李朝津、許育銘編，《多元視野下的中華民國外交》。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2年。
- 王文隆，〈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對緬甸的接觸與政策〉，「紀念全民抗日戰爭爆發八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中國國民黨文傳會黨史館、中正文教基金會，2017年7月7-8日。
- 王連浩、陳勇，〈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及知識界對大泰族主義之回應〉，《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
- 朱宏源、潘昭榮，〈國軍反攻緬北戰鬥特色研析〉，《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8期（2003年4月）。
- 張奕善，〈二次大戰期間中國特遣隊在馬來亞的敵後活動（1942-45）〉，《國立編譯館館刊》，第2卷第2期（1973年9月）。
- 許文堂，〈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中、日、法在越南的交涉與衝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4期（2004年6月）。

五、網路資料

- http://www.oac.cdlib.org/findaid/ark:/13030/tf8f59n9h7/entire_text/（2018/3/6點閱）。